



杨树浦路上杨树浦水厂是英国城堡式的建筑。摄影 / 种楠



经过更新改造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广场已正式开放。摄影 / 杨建正

李天纲认为，讲近代上海文化，东区比西区更早，也更重要。西区的徐家汇 1847 年就建设了，但它是教区型社区，是华界里的特例，风貌习俗和市区迥异，应单独处理。虹口则不同，这里自同治年间(1862—1874)以后不断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都是市民社会里堆积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。

比如，要讲中国近代史上的“杨树浦工业奇迹”“商务印书馆事业”“全面抗战”“大上海计划”“左联文艺”等事件；要讲文惠廉、林乐知、李鸿章、伍廷芳、颜惠庆父子兄弟、宋氏大家族、张元济及其同仁，还有胡适之、周树人等人物……都要从虹口、从“北外滩”开始。乍浦路、海宁路一带的密集影院，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；话剧、已经快要成为“非遗”的越剧、沪剧、锡剧、淮剧、滑稽戏，都诞生在这一块市民生活的土壤。

如果说“海派”是上海的市民文化，那么虹口（北外滩）地区才是真正的发源地。在李天纲看来，英、美租界引进 19 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，与界内华人同享共用。与封闭、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，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，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。换言之，各个地方的人来了以后，遵守同一个制度，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包括方言、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、职业特征……

“说上海文化排外是没有道理的，最早突破地域限制，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。”李天纲表示，现在有什么问题有现在的原因，而传统的“海派文化”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，是融合而非对立，上海各族群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可以的，关系紧张并非常态。比如，方言最表现“文化多样性”，“海派文化”对各种语言、习俗、价值观的包容

性是相当宽泛的，以至于有人还批评它油腔滑调，市民气太盛。今天的上海话，是由本地话、苏州话、宁波话、广东话，以及一部分英语表达习惯融合形成的那种多样性。

又比如饮食文化。有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1 年 1 月，上海已经拥有近 7000 家咖啡馆，超越东京、伦敦、纽约等城市，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。但事实上，早在近代的上海，咖啡馆、西餐馆就开始逐渐遍布城市的商业中心、繁华地带。

李天纲表示，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，章太炎初到上海，三天两头就被朋友拉到福州路 22 号“一品香”吃大餐。“一品香”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，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，一条一条的纹理非常清晰。又比如罗宋汤，是白俄经西伯利亚，再从东北带来的，已经是上海的家常菜。再比如，长春、哈尔滨西点、面包，在最近这一波咖啡、西饼店开业潮之前，早就成为餐桌主食。记得 85 度 C 开业时说它要是把咖啡文化传播到上海，老上海人内心是暗暗发笑的。上海人可以本埠，可以客帮，也可以西洋，练就了各种“多样性”。“海派”的多样性在很多地方已经被大一统的做法掩盖住了，但在这些生活习俗的细节上却还顽强地保留着。

以上这些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，在经由本土化积极调适后，一步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，悄然引领市民文化发展蜕变，不断丰富海派气质与文化。从中可以清晰看出，海派文化内生着开放性、创造性、扬弃性和包容性。

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，民生日益艰难，上海市民文化确实变得消极，有人称之为“小市民文化”。李天纲坦言，即使上一代人面临诸多困难，但精神状态还是积极的，就像他们在克服战乱年代带来的艰难一样，仍然想恢复曾经的稳定和繁荣。但